

《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考

黄明信 申晓亭

一、书名与卷次

在搜集整理蒙文古籍的过程中，我们复印了内蒙社科院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历法学丛书。此书为康熙五十年（1711）木刻本。原书为线装，双栏，栏框高25.3厘米，宽16.5厘米，行文每栏为八行，白口，书口上部有卷名、卷次，中部有章节题名，下部有汉文的译名、卷次，及叶码；每卷书文前有卷名或章节名。

我们没有见到这一复制品的总书名，据《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所记，该书的前半部题名为：《qitad ĵiruqai yin sudur eče monggolčilagsan ĵiruqai yin gool》，直译即：《蒙译汉历正要》，该书的后半部题名为：《qitad eče monggolčilagsan ĵirugai yin nomlalga》，直译即：《蒙译汉历原理》。《联合目录》上的该书有个汉译名为《（蒙译）数理精仪丛书》。此译不知有何依据，但我们认为它不够妥当。蒙文ĵiruqai一词多义，可做星相学、历法学、数学讲。四库全书中的御制《律历渊源》一百卷包括三部分：（1）《历象考成》、（2）《数理精蕴》、（3）《律吕正义》（论述音乐原理）。《数理精蕴》讲的是数学，而这部书讲的是历法

学，但又不完全相同于《历象考成》。仁钦戈瓦在《蒙古文翻译史略》^①一文中将此书称为《天文历算正要》。基于上述书名之不统一，我们根据此书的蒙文题名、序文内容，并参考该书藏译本的题名^②，将这部书拟名为：《康熙御制汉 历大全蒙译本》。

据悉，此书除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之外，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还各藏有一部。

原书卷次紊乱，两套排号，各不齐全，互有重复。经过整理，区分出卷次完整的一部及卷次残缺的一部复本。其卷目如下：

汉历蒙译序 一卷，7叶；

日躔表 二卷，卷一90叶，卷二54叶；

月离表 四卷，卷一41叶，卷二28叶
卷三34叶，卷四50叶；

土星表 一卷，68叶；

木星表 一卷，67叶；

火星表 一卷，60叶；

金星表 一卷，65叶；

水星表 一卷，65叶；

五纬表 一卷，63叶；

交食表 八卷，卷一59叶，卷二51叶，
卷三42叶，卷四41叶，
卷五63叶，卷六58叶，
卷七34叶，卷八41叶；

（增）交食表序 一卷，19叶；

（增）交食表42° 一卷，23叶；

（增）交食表44° 一卷，18叶；

（增）交食表46° 一卷，17叶；

（增）交食表48° 一卷，17叶；

（增）交食表50° 一卷，18叶；

(增) 交食表 54° 一卷, 18叶;
(增) 交食表 58° 一卷, 17叶;
(增) 交食表 62° 一卷, 18叶;
(增) 交食表 66° 一卷, 18叶;
天文步天歌 一卷, 29叶;
八线表 一卷, 108叶;
凌犯表 一卷, 17叶;
仪象表 一卷, 76叶;
七政 (18叶) 新七政 (15叶) 合为一卷共33叶;
交食草 (34叶) 交食细草 (21叶) 合为一卷共55叶。
全书共三十七卷, 1584叶^③。现将序文一卷翻译注释如下。

二、序文译注

《汉历蒙译序》

印度古代历法有外道^①与内道两种, 外道之历远在释迦牟尼诞生之前即有传播; 内道之历即时轮历, 则是释迦牟尼口述《时轮根本经》^②之后传播的。

至于汉地, 朝代多次更迭, 非仅一姓。在二十二代王朝^③之前便有历法^④, 自是以后, 历法有七十二家之多^⑤, 虽皆系计算日、月、曜、星的运行周期之理, 但都不是精确无误, 明白无遗。

在西藏有纯内道的体系派的历算^⑥, 也有内道与外道合参的作用派历法^⑦。虽然这两种历法都渊远流长^⑧, 但是精确地推算日、月食的时刻, 必须把地理位置之高低、日月出没时刻^⑨的因素都考虑在内, 而这两种历法都没有写出来, 这就给历算家们的精确计算造成了困难。我们蒙古如果仅从藏地翻译引进历算, 就无法解决这类计算上的困难。

文殊师利护祐之下的汉地^⑩则已将一切历象典籍之精华集中起来，剔除不明确之处，增加新的知识，将各地地理位置高低之观测法^⑪，及有关日、月、曜、星的各种行度，全部明确无误地展示出来了^⑫。因此，为了精历算，彰百家，益算者，圣文殊师利康熙皇帝召谕将此前所未有的历算典籍之精本^⑬重新用汉文编写^⑭，再用蒙文翻译刊刻^⑮。

谨遵圣命，我等将文殊师利圣天子历算新编中计算日、月、曜、星之时刻，地理位置之高低之精确数据及其图、说，以及学习、使用历法必需之典籍都译成了蒙文并刊刻木版。

从繁荣昌盛之汉地，将文殊菩萨所传汉历译成藏文曾有多次^⑯，但将其奥义真谛《文殊皇帝御制汉历》译为蒙文则大非易事，只以圣旨难违，唯有竭尽赤诚，尽力而为。此汉历新编犹如文殊师利智慧渊海，汪洋浩瀚，博大精深，又无前人之蒙文旧轨可循，译文不确、不达之处在所难免，尚请方家见谅。

译者孤陋寡闻、才疏学浅，实难胜任，理解不透之处，含混浮泛之词亦出于无奈。幸得学博识广之士赐予审阅，匡正谬误，或尚不致贻误众人。

经过此译，历算真谛必将流传于各方，流传于整个大地，永不停息，不断完善，终不负众人之望也。

康熙五十年八月初八日，始译自汉文。

下面是翻译通事名录，领衔者为奏藏蒙事内府御前侍卫拉锡^⑰，次名为藏文学校藏蒙文教习扎萨克喇嘛丹金格隆，其他主要有：蒙历法师伯吉，蒙译师奥其尔，汉历法师何国宗、刘玉思等共三十六人。

序文注释：

①外道，印度各教派都自称内道而把其他教派叫做外道。此处指佛教以外的其他教派。

②《时轮根本经》据说是公元前881年释迦牟尼临近涅槃时口述的，公元1027年传入藏区。原文有一万二千颂，藏文只译了其中的一品。对其真伪曾有过争论，后经布顿和宗喀巴等大师的肯定，才被普遍地接受，在北京版的蒙藏文大藏经中排在首帙。

③汉文的纪传体史书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二种称为二十二史，将新唐书、新五代史也计算在内即现在通称的二十四史。并非二十二代皇朝，原作者于此名称的理解不甚准确。

④这句话是科学的，各民族由于生产与生活的需要都不能不有其各自的纪日、纪月以至纪年的方法。黄宗羲说：

“三代以上，无人不知历”。

⑤七十二是个成数，并非准确的统计，不过大体也差不多。《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列举时宪历以前的历法九十一一种，其中有二十二种未颁行，曾颁行者六十九种。

⑥体系派与作用派都属于时轮历系统，来源于印度。体系派注重数值理论体系的完整，故名。

⑦作用派注重应用（主要是推算日月食的准确与方便）。据说体系派是以《时轮根本经》为依据，作用派是以《时轮摄略经》为依据，而《时轮摄略经》是吸收了作用外道的历法而成的。

⑧体系派计算中所用的近距历元是公元624年，作用派计算中所用的近距历元是公元806年，这可能是实际上产生该历法稍前不远的年代。

⑨这里“地理位置的高低”指地理纬度的高低。月食的食分各地所见相同，与纬度关系不大。日食则各地见食与否及所见的食分大小相差很大，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纬度；“日月出没时刻”是晨昏的日月食见食与否或带食出没的决定因

素。时轮历只考虑黄道经度，未考虑纬度的因素，所以日食的预报误差较大。

⑩蒙藏佛教徒认为西藏是观音菩萨教化之域，蒙古是金刚手菩萨教化之域，汉地是文殊菩萨教化之域。汉地的皇帝是文殊的化身，汉族的历算是文殊菩萨留传的。

⑪《新法算书》有测北极高度的方法，并有北京圆明园内畅春园观测所得的数值及十八省省会、蒙古各盟旗所测的北极高度（代表纬度）和时间差（代表经度）。

⑫这一段是指《新法算书》的前身《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这些书是明末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编写的，采用的是十六世纪丹麦的卓越的天文观测者第谷（Tycho）的系统与数值。蒙译者不甚了解这一段来历，由于是通过汉文而得到的这种知识，因而笼统地说是汉族的。

⑬指《西洋新法算书》，因其不是完整地一次进呈，而是陆续编译陆续进呈，所以成了丛书的形式，而且章节较乱。

⑭指1669年完成的《新法算书》整整一百卷。

⑮即指这部蒙文译本。公元1711年刊版，三十七卷。

⑯藏文史书中说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入藏带有算书，并曾派人入唐学习、翻译。但我们未找到所译是何书，从流传的书名看来大都是占星择吉、卜筮堪舆之术，未见唐代历书的藏译本。

⑰《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译本》后记中作御前凯雅·扎西。

三、源与流

以下谈谈这部《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的源流及其在蒙藏科技史上的影响。

我国有悠久的历法学史，清朝以前用汉文正式颁行的历法就

约有六十余种。实行最长的是元代王恂和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在明代改名《大统历》，实际内容未变。这种历法先后使用了三百六十多年。《授时历》比以前的各种历法都精确，所用的数据当时在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但仍然有细微的误差。经过三百多年，这些误差积累起来，就形成了较大的数值，影响到推算日、月食的精确，到明朝晚年就很清楚地感觉到重新修改历法的必要了。这时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十六世纪末欧洲的天文历算。这时欧洲已经有了望远镜等观测手段，其成就已经超过十三世纪授时历的水平。于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向他们学习，1635年制订出新的历法一百三十七卷，取名《崇祯历书》，已经刻版，但由于政治动乱，没有来得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顺治元年（1644）清朝在北京建立政权，曾经参加《崇祯历书》编写工作的意大利传教士汤若望，把这部书稍加删改压缩成一百零三卷献给清廷，取名《西洋新法历书》，清廷果断地立即采用，顺治二年（1645）颁行，并且给它定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时宪历”。时宪历从顺治二年（1645）颁行到清末（1911）共沿用二百六十多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改用公历，时宪历则被称为农历，与公历并行。

《西洋新法历书》的木版入清后曾经多次挖改或重刻，卷次紊乱。1669年重编卷次为整一百卷，并改名《新法算书》，后被收入四库全书。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当时虽然在天文历法上有较高的水平，但是为了保持他们在学术上的垄断地位，采取了“留一手”、“故神其技”的手法，致使《新法算书》中有“图与表不合而解多隐晦难解”等严重缺点。

公元1661年康熙即位，他对数学和天文学有很大的兴趣，而且系统学习过，到晚年曾组织我国的天文学者重新修定《新法算书》，从康熙五十三年（1714）开始，到他去世那年（1722）才

完成，题名《御制历象考成》。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成书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从它的成书时间看，它在《新法算书》之后，而在《御制历象考成》之前。从内容上看，《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大体上相当于《新法算书》的卷二十五至卷八十二，而略去了其中讲原理的《历指》十余卷；对于《历象考成》来说则等于是只译了表十六卷。上编《揆天查纪》十六卷和下编《明正时度》十卷则均未译。总之，这是个选译本，只选了推算时直接用到的实践部分，而省略了原理部分。

我们拿蒙文交食表卷一开首的三页与汉文《新法算书》核对过。算交食诸表法的说明，历元后二百年五行（hang）表^④的算法，以至所举崇祯元年戊辰（公元1628）的例题，都与《新法算书》字句完全吻合，而与《历象考成》有出入。

经过初步核对，《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相当于《新法算书》的卷数如下：

日躔表二卷相当于卷二十五、卷二十六，
月离表四卷相当于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五，
土星表一卷相当于卷四十六、卷四十七，
木星表一卷相当于卷四十八、卷四十九，
火星表一卷相当于卷五十、卷五十一，
金星表一卷相当于卷五十二、卷五十三，
水星表一卷相当于卷五十四、卷五十五，
五纬表一卷相当于卷四十五，
交食表八卷相当于卷七十二至卷七十九，
八线表一卷相当于卷八十一、卷八十二。

只是天文步天歌、凌犯、仪象、七政、交食草、增交食表共十五卷尚有待于进一步仔细查核。从内容上看，步天歌卷讲三垣四区廿八宿的星名、星数、形状和位置^⑤。凌犯卷是行星与恒星

的会合表。仪象卷是黄道和赤道经纬度的换算表。七政卷为推算日、月、五星位置的步骤。交食草卷为推算罗喉的步骤。增交食表十卷是因为原交食表仅到北纬 40° 为止，是为北京及其以南地区用的，对蒙古地区不适用，所以又增加了 42° 至 66° 的表。

在整体结构上，《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与《御制历象考成》是相差较远的，可见此书是以《新法算书》为主要蓝本，经过选择和整理而进行翻译的。这与蒙文序文中所谈的相吻合，只是序文中所说的《康熙御制汉历》，不是指《御制历象考成》，而是指《新法算书》。

从序文中可以看出，康熙帝欲把汉历翻译成蒙文是由来已久了。其目的在于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时宪历——这个当时最先进的历法。

为什么先译成了蒙文，而没有同时或先译成满文或藏文呢？我们分析这是因为蒙族学者有其得天独厚的地方。第一，蒙族在天文学上有较长的历史，它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注意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兼收并用其他民族的历法。十三世纪初，最早的蒙古史书《元朝秘史》中就采用了十二属象纪年法；在元代初期，曾采用过金的“大明历”，其后编制过著名的“授时历”，并在钦天监中还曾有人编制过“万年历”（即“回回历”）；十五世纪以后曾兼用汉历与藏历。蒙族有自己的杰出的天文学家，著名的有：铁木尔的孙子乌鲁伯格（1394—1449），明安图（1692—1763）。第二，蒙族统治过汉地，吸收了不少汉族文化，精通汉语文和汉历的人比较多。相比之下，满族的文化历史较短；藏族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但离汉地较远，精通汉语、汉历者不如蒙族多。第三，由于蒙族信奉佛教，佛教是从西藏传来的，蒙族喇嘛都是要习藏文、藏经的，所以蒙族中也不乏有精通藏语文与藏历者。

基于这些因素，所以首先出现的是汉历的蒙译本，这部《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本身就显示了蒙古族科学家的天文历法

知识和语言翻译水平。而且，这个译本的出现确实起到了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时宪历的作用。首先是使蒙族学者掌握了当时的先进历法——时宪历，并使它在蒙族地区得到推广和应用，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时宪历在藏地的传播。

藏族有历史悠久的、独具特色的藏历，藏历在我国丰富多采的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藏历的基础是时轮历。十一世纪藏族从印度引进了时轮经，保存在藏文大藏经里。十三世纪藏族开始有了自己关于时轮历的著作，其后流传渐广。直到现在，西藏天文历算研究所和印度达拉母萨拉每年出版的藏历，基本上仍是属于时轮历体系的，不过吸收了不少时宪历的内容。

藏历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吸收了一些汉历的内容，如“霍尔月”^⑥、二十四节气和春牛经等。但都是枝节的，不成体系的。有系统地从汉族引进的历法只有一种，这就是十八世纪从北京引进的时宪历，而《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则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时轮历在推算日食、月食方面不够精确，基于历算上和宗教上的需要，藏族的历算学者们渴望掌握汉族的推算方法。又因能从蒙文译成藏文的人才比能直接从汉文译成藏文的人才容易得到些，于是《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译成之后，马上就被转译成藏文。关于此事，《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译本》的校阅刊版题记中写到：“……文殊诞生后二千四百九十二年（公元1654年）？康熙帝诞生，铁牛年即帝位，大弘佛法……集一切历象典籍之大成，以汉文撰写成书，于汉地广为传播。复命驾前之凯雅扎西主持，与汉蒙大师共译成蒙文。又命文殊大皇帝之亲弟子，精习此道之格隆·阿旺罗卜藏、格隆·丹巴加木参二人为钦使，携此蒙文译本送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请其译为藏文。于是以大师为首，与呼毕拉干·兰占巴、衮班智达、额尔德尼·毕力克图等共同译成后，进献于帝。时予承乏驻京掌教，奉旨校阅刊版，参与其事

者有总管京师喇嘛扎萨克·阿旺巴拉珠尔呼图克图（以下名单共八人，略），竭尽棉薄、细勘蒙藏两文，遇难解处则对勘汉文；浑天仪等图绘制者系汉族算术博士刘玉思。大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刊版”^⑦。

《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译本》是一部忠实于原著的选译本，可惜译笔生硬晦涩，加之一些藏族的历算家们缺乏几何、三角的数学基础，因此无法使用此书。这样，虽然有了时宪历的藏译本，但是还未能达到时宪历藏传的目的。

虽然如此，《汉历大全》蒙译本和藏译本的出现，究竟是大大地方便了蒙藏学者对时宪历的学习与研究。不久（乾隆初年），雍和宫的一位蒙古族喇嘛将此书学通，创造了一套与时轮历的运算方法揉合起来的方法，随即有人用藏文写下来，题为《汉历中以北京地区为主之日月食推算法》，通称为《汉历心要》。此书末尾有一段题记：“《以首都北京地区为主之日月食推算法》系华瑞马杨寺^⑧之数理学人索巴坚参，依精于此道之师尊口传，忠实于支那历算原文而意译。愿此法遍扬于大地！”题记下面另有一行小字写道：“此汉历系录自马杨历书，尾跋原文如此，唯北京雍和宫及蒙古地区亦有此法流行，予曾见其书，历元年份、正文词句以及表格均与此无异。彼等云系此前雍和宫之一精通历算者所授，但均无署名。”^⑨

把卷帙浩繁达一百卷的《新法算书》压缩到六十页的藏文（包括表格），并使其能为广大的藏族学者接受，能实际运用它来推算日月食达到比时轮历精确一些的效果，实在难得！可惜是改编者没有留下姓名，但从中也足以看出蒙古族科学家之聪明才智了。

之后，《马杨寺汉历心要》就成为藏传时宪历的祖本。到这时，时宪历藏传的目的可以说基本达到了，藏族的天文历算学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不过广泛地传布还有一段过程，十九世纪中

《汉历心要》从甘肃东北部的马杨寺传到甘肃南部的拉卜楞寺，1879年该寺建立喜金刚院传习这种汉历，每年自己编制“黄历”，直到1958年，八十年间没有中断过。二十世纪初年传到了拉萨，在藏医院里设立了传习的课程，并将按这种方法推算日月食的结果载入每年编制的藏文年历里，至今仍保持不断，也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了。

二百多年来，蒙藏历算家关于时宪历的著述不下二、三十种^⑩，大都是祖述马杨的，但其中有一种例外，即《摩诃支那传规日月交食推步术》（藏文）^⑪。此书的作者也是雍和宫的蒙古族达喇嘛，名叫乌里季巴图。此书的历元为1864年甲子，比《汉历心要》虽然时代晚，内容却多一些。例如：关于黄赤升度表有一说明，大段引用了《汉历大全》里有关的原文。又如：求各地交食三限的时刻，《汉历心要》只给出了北京和吐蕃的时差而没有给出经纬度，此书则完整地给出了康熙年间实测的十八省首府和蒙古二十二个旗的北极高度和距京师的偏度。可见它与《汉历心要》虽是同源，却是《汉历大全》的另一分支，它在蒙藏历算学典籍中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总之，一部浸透蒙古族科学家智慧的《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促进了蒙藏历算学的发展，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它应该在蒙族科技史上，在我们伟大祖国的科学文化史上占一席应有的位置。

注：

①见198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语文翻译研究论文集》第13页。

②该书的藏译本题名为《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译本》（hjam-dby-angs bde-ldan rygal-bos mdsad-pahi rgya-rtsis bod-skad-du bsgyur-ba）。

③据悉，与内蒙社科院图书馆所藏本子相比较，内蒙民族师范学院所藏本多交食表第九卷，蒙古人民共和国所藏本缺（增）交食表序卷。

④首朔、太阳引数、太阴引数、交周度、太阳经度各佔一栏，即一行。见附图 I。附图 I 取自（增）交食表序卷第二叶下。

⑤此天文步天歌卷与李迪的《（蒙文星占学）研究》一文中的第二部分第三章相当。

⑥十三世纪西藏从元朝接受了汉历的以寅月（冬至后第二个月）为正月即年首，称之为“霍尔月”，也作“蒙古月”。

⑦见黄明信、陈久金《藏历的原理与实践》570—571页，民族出版社，1987年。

⑧马杨寺在今甘肃永登与阿拉善旗交界处。

⑨见《藏历的原理与实践》418页。

⑩见上书582页以下。

⑪北京图书馆藏手写本，他处未见。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本刊主编易人

〔本刊讯〕由于人事上的变动，本刊主编自一九八八年一月起，由陈翔华同志担任。目前暂不设副主编。原主编、副主编不再担任本刊编委工作。
